

超越忧患的求索

—— 彭定安学术生涯
40 周年纪念文集

王建中 主编

迁宁人民出版社

文化学者的高尚品格： 来自友人的真实素描

——序《超越忧患的求索》

○ 王建中

我通读了全部书稿，编完了这本“文集”。按常理，作为书的主编，总要谈点什么，要说的话很多，但又无从谈起，想来想去，还是从筹编这本“文集”谈起吧。1997，是个不平凡的年份，香港回归，万民欢腾，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树立了又一座“里程碑”。而就定安同志个人来说，1997也是值得好好纪念的，是他学术生涯40周年。1998，又是他的70华诞。在1997~1998之交选编和出版这本“纪念文集”，其双重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他在这40年的学术生涯中，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可以说是一半险路，一半坦途。但是，在这20余年坎坎坷坷的长途中，他并没有虚度年华，而是“超越”了种种“忧患”，在不断的“求索”。他沉入底层，“潜心研究”，加之对人生和世态的细心观察，把逆境和厄运变成前进的动力。这为他后20年走入科学殿堂，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定安同志的经历中，进一步验证了下述名言的无比正确：“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别林斯基）、“逆境是达到真理的一条通路。”（拜伦）、“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

(培根)。这特别表现在他“走向鲁迅世界”的切身体验上。在那“文革”十载风狂雨骤的岁月里，他颠簸于风沙漫天的塞外僻乡，思想与生活一样的简陋。可是他却从一部残缺了的《鲁迅全集》中汲取了滋补身心健康的养料，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超越忧患”，走出困境。正如宋学知在《他塑造他心中的鲁迅》这篇评文中所概括：“他没有条件在神圣庄严的研究机关或高等学府里冷静而严肃地研究鲁迅，却在自己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热情而挚着地思考并探索着鲁迅是怎样在跌宕变幻的人生道路上对待国家、民族、人民、世界以及人类的。”鲁迅，是彭定安这位“跋涉者的精神绿洲！”

对一个人的了解，即或是对一个知心朋友的了解，也有个逐渐加深的过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定安同志几十年的人生旅程中，接触了众多同行和友人，自然留给他们的以深刻的印痕，他们所写的纪念文章和文评大作，实际上是对定安同志为人、为父的真实素描。我正是从他们多侧面的素描中，对定安同志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他的为人与为父是一致的，他的学术品格正是他的高尚人格的体现。我很赞赏李春林等在《一部系统地研究鲁迅杂文学的奠基之作——评彭定安〈鲁迅杂文学概论〉》一文中的一段评述：“本书作者彭定安同志的人生道路相当坎坷。这并不决定于他的艺术气质与学术水平，乃是他的思想品格所命定。良知决定了他作为一个文化人，在那些风云变幻的年代里的思想追求与价值取向，而恶运与悲剧同这类文化人有着天然的、不可抗拒的亲和力。这种人格特征与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在从事学术研究时，不能不把研究对象的思想品格置于首位，尽管他明确声称并在极力推行把鲁迅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来研

究。因之，这就决定了本书一个根本性的特点：在这本《杂文学概论》中的所有篇章，都闪射着鲁迅的人格光辉，迸发着鲁迅的思想力量，即便那些探讨纯艺术、纯技巧（例如语言的运用）的章节，也或以鲁迅的人格光辉来烛照，或用鲁迅的思想力量来统辖。这正抓住了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内核，即：主要是他的思想与人格使他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而他的艺术特质是第二位的。基于此，作者才能有这样的史识与史才，将鲁迅创作杂文的总体精神和他的杂文艺术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烈士品格哲人心，诗家气质才士身。’”

定安同志虽然年近古稀，可是他却具有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在学术研究上，敏锐地汲取新的思想养料，睿智而好学，谦逊而求索，博得了老中青三代友人的赞美、崇敬与爱戴。李作祥认为，“在辽宁的理论界和文化界中彭定安是一位最有‘环球意识’的理论批评家”。（《简论彭定安》）邱长发称彭定安是位“大家”，这是指他学问的渊博、著作的丰厚、他对文化的传播和贡献、他诸多社会兼职的声望和荣誉。他说：彭定安“是真正意义上的著名，亦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大家风范》）刘黑枷把彭定安看成是“确有真才实学”的“正宗”的学者。他如“秋天的谷穗，不显山不露水，总与大地挨近。实际这谷穗沉甸甸，籽粒最饱满，最成实。定安颇似韩愈所说的‘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定安同志是我的学长》）

早年，定安同志作为为别人做嫁衣裳的报社编辑，对作者关怀备至，有许多佳话流传。1958年，刚刚15岁就读初中二年级的胡世宗，以一个少先队员的身份写了一首题为《给阿拉伯小朋友》的自由体小诗，寄给当时的《辽宁日报》。这是他第一次向报刊投稿，不到一星期，这首小诗竟

然在报纸上发表了。事隔20年，胡世宗成了著名诗人，他在一次省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上打听到当年发表这篇小诗的责任编辑竟是著名学者彭定安，惊喜之余，当即向与会的彭定安致以衷心的、迟到的谢意。以后，每当在一起聚餐，他都为这件事向彭定安敬一杯酒，并曾在许多文章中谈及此事，以表答谢意。此次，他又在《与彭定安先生的交往片断》一文中写到了这件使他难忘的事。他说：“正是这首小诗的公开发表，使我这个热心于文学的少年暗暗下决心走上文学创作的漫长的道路。彭定安先生编发这首小诗，在他，是严肃、认真的工作的一部分，而在我，却是人生道路的重要的导向！”——这是个感人的故事，也是彭定安出于平常心所做的一件平常事。

在定安同志的交际圈中有许多年轻朋友，由于他关怀他们，也博得了他们的敬爱。他们敬重彭定安的渊博的学识，更敬重他的高尚的人格。刘兆林以“正人君子”四个字来概括彭定安的为人，并解释说：“他的正人君子之正，不是一脸肃杀一本正经的正，而是端正的正，不走邪门歪道的正，心正的正。”他认为，“作为建造晚辈们成长的一片环境，他发挥了不少滋养的作用。”“我省不少中青年作家得益过这种滋润。”他还举了青年作家胡小胡的长篇小说《太阳雪》受到彭定安器重的实例：“胡小胡的长篇小说《太阳雪》样书刚出来时正赶上过春节，小胡就把自己这部新作当拜年礼物送给彭定安老师了。彭老一气读完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又放弃了春节期间的一切娱乐活动，一连写了三篇评介文章，后来又在该作的研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我眼中的彭定安先生》）——这是又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对一位年近古稀的学者来说，能够做到这一切，谈何容易？如果没有

关怀青年作家成长的高度责任感，没有顽强的毅力和炽热的激情，是难以办到的。

恕我不厌其烦地复述某些作者的原话，这是他们的切身感受，肺腑之言，因而是真诚的、实在的，没有丝毫虚假，自然也映照了彭定安纯净无私的精神世界。

定安同志与青年人打成一片，正反映了他自己年轻的心境。他的一言一行都对年青人有所启迪，有所影响，这里，没有两代人常见的“代沟”，更没有“文人相轻”的陈风陋习。刘元举说：“他是一个形象，一个标尺，一个特定涵义的符号。”刘元举与彭定安第一次相识是《鸭绿江》杂志社在金石滩举办的一次笔会上。他们同居一楼，彭定安读书到深夜的强烈求知欲，深深地感动了刘元举，他还结合《手相梦》出版前后的情景述说着自己的印象：“我更加感受到他对于任何方面的知识，哪怕是异端邪说也是一本正经认认真真的，这是一个正宗学者的姿态。不仅感动了我，也着实影响了我。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更多的时候是埋头读书，认认真真地积累一点东西。他曾给我写过一篇评论，是评我的散文写作。他对于我的几篇关于建筑文化艺术的散文比较欣赏，从中可以看出来他是多么希望我们这些晚生能够具有更多一些文化和学识啊！”其实，定安同志的每一次演讲或发言，对年轻人也都有所教益，这也是刘元举的切身感受：每次聚会，“他出现的时候总能牵动人们一片尊敬的目光。而聆听他的谈吐，实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他的信息量大，总有新的东西吸引你，引你思考。无论他在谈到伯尔还是谈到鲁迅，无论他是谈‘高峰体验’还是谈东西方文化的对比，总是让我感到耳目一新，总是觉得会上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他没有讲足，我们也没有听够。每一次都听不

够。但是，每一次都觉得他的话像灯塔一样可以照亮一片创作的天地。于是，对于彭老便有了更深的敬重。”（《正宗学者》）作家荒原也说他“学识渊博，思考深刻，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尤其让我吃惊的是，他总能向大家传达最新的理论热点和学界信息，还不时用英语或德语说出几个单词，这让我想到他每天得有多少时间用来读书，如何保持着思想的青春活力。”“‘文化’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谈文化问题是他至少近十年来最感兴趣的。他给文学写作者带来的是个比文学更大的概念，是超越世俗生活之上的更高级的启发，听他讲话的时候，常常也是我性灵致远、思维活跃的时候。”（《谦谦君子，耿耿学人》）定安同志就是这样与青年朋友的思维、感受息息相通，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在定安同志所关注的友人中，既有专业作家、科研工作者，也有业余文学爱好者。如沈阳黎明公司的工人张树堂、本溪钢铁公司的干部王积彬等，都得到过定安同志的关心和鼓励。他给他们的文稿提出修改意见，为他们的书作序，向学术界、创作界极力推荐他们。对学术同行，更是关怀备至，他为李春林所著《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精心撰写评语，使其参加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读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就是典型一例。李春林著文赞扬定安同志对中年学者的苦心培育。他说：“彭先生作为既是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又是比较文学专家的大学者，总是能得理论之先，又能对研究对象（作家作品的具体形态）与研究主体（研究者的思维模式、知识框架、价值取向：情感世界与理论天地）及研究成果（多少因袭，多少创新）作出准确的判断。”“彭先生此处所谈是小书的学术价值，然而对于我的意义就不仅是学术性的了：坚定了我的人

生方向，给我以在困难中前行的勇气与力量。”（《鲁迅风骨，托翁情怀》）可见，定安同志的所为，对中青年学者的成长所起的巨大作用了。

在定安同志身上，多的是学者风度，大家气质，待人和蔼，平易近人，少的是文人的傲气和自命不凡的劣性。有些报刊记者，哪怕是小报小刊，只要找到他的头上，他都有求必应，积极撰稿，即或对东北大学校报这张影响面很小、校内发行的小报也是如此。作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首任院长的彭定安，不仅接受了东大校报特邀顾问的聘请，还担任了校报的特邀撰稿人，主动为校报写文章。为加深理工科学生对学习文科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促进学生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他撰写了《论理工科学生学一点文科知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东大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后，为搞好学科建设，他撰写了《我对研究型大学的一点知识》，……这些文章篇幅虽短，却有着很强的针对性。东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邓美凤认为：“他的文章篇篇精品”，“有着撼人的思想力量，给人以深刻启迪。有的文章也成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所以，“被很多读者收藏”。（《我眼中的彭院长》）

东大校园内有一座彭达烈士的塑像。1952年彭达烈士牺牲时，定安同志正在《东北日报》当记者，《人民的好儿子——彭达》这篇文章就是他采写的。42年后的1994年，当他目睹这座塑像时，自然颇有感触，于是主动提出要在校报写篇文章，而且还邀请原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彭达的亲戚并带领彭达参加革命，当年也曾发表过记述彭达思想成长的文章的于铁，也为校报著文。几天之后，定安同志的《血染春华永不凋——致彭达感言》见报了。文中写道：

“我喜爱中国的一个人生哲学命题：片时千古。你在为国为民倒在血泊中而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的那个‘片时’获得‘千古’。但有人即使成了‘千古’，却只等于‘片时’而且‘其值为0’。”他认为，“彭达的塑像不仅是一个‘立功’的丰碑，而且是一个‘立德’和‘立言’的启示录”，他希望“经常有人在塑像周围徜徉，追思和悼念彭达，解读他那无言的启示，从他获得的终极意义中去理解和追寻现实中的、每天生活中的、植根于‘为他者’中的终极意义。”于铁则在文章中详细回顾了彭达烈士的英雄事迹和献身精神，以及温故知新的感想。这两篇文章在校报发表后，在东大校园里产生强烈反响，每当新生入校，清明节来临，很多学院的学生干部，都来宣传部索要这张报纸，从这里不仅了解到英雄的事迹，更受到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获得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启示。邓美凤颇有感慨地说：“他不因他的学问、地位对我们这张‘小报’有任何的轻视，从他的行动中他的文章中，我读出了他的境界，他的追求，也读懂了他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成就，也从中找到了做人的楷模。”（《我眼中的彭院长》）在人的一生中，很少经历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琐事中，表现出一个人的心灵世界。正所谓从一滴水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辉。然而，凡事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表现一个人的正直、崇高、谦逊而真诚，又谈何容易。而有些所谓“名人”则傲气十足，对“凡人小事”不屑一顾。相比之下，更感到定安同志待人谦和、办事认真这一品格之可贵。

在东北大学的几年工作中，定安同志不分巨细，身体力行。根据国家教委的部署，学校开始进行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成立了文化素质教育领导小组，他担任副组长，不仅

进行理论思考，而且在实践中率先垂范。学校创办文化素质教育研讨班，定安同志是发起者，也是第一个开班者。他所开办的“科技文化与社会进步”研讨班曾在学生中引起极大兴趣，吸引学生中众多优秀者参加，为以后的办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此外，他还聘请了近10位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著名学者、教授，为学生开设选修课，为东大的文化素质教育带来了一股春风。（王宁：《彭老师对我的帮助与支持》）

定安同志是在卸掉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刚刚离休之日，被复校后的东北大学选中的。那么，他何以能够担当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首任院长这一重任，对某些人来说始终是个谜。当时是东北大学校长的蒋仲乐教授在《我与彭定安从相识到相知》这篇文章中揭开了这个谜底，述说了个中内情：1993年，东北大学复校，作为全国重点综合大学需要建立文科学院，但当时的校领导班子成员都是工科出身的技术专家，对文科不够了解，于是请到了定安同志就有关问题进行咨询。他就理工渗透、文理融合、人才培养、师资来源等如何办好文学院提出了高屋建瓴而又切实中肯的四点意见，深深地打动了与会的东大领导。蒋仲乐教授写道：“虽是第一次接触，但彭先生给我的印象极好。首先，我认为他是一个做事认真、有责任感的人。看得出他到‘东大’是有备而来，他的意见是经过认真思考提出来的，因而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第二，我认为他是很有学问的‘大家’。他站得高、看得远，他的论证可以说帮助我们提高了对组建文科学院的认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促使我们下了决心；他给我们的第三个印象是谦虚、诚恳，学者风范。有了这三点印象，我突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认定在‘东大’这样一所国内著名重点高校组建文科学院，彭定安是最佳人

选，甚至，可以说非他莫属。”于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变化：“在此之前，由于组建文法学院尚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院长人选还是一个没排上议程的问题。”可在这个咨询会上，由于意向确定，决心已下。他便“当即提出，请彭定安先生出任文法学院院长。彭先生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个请求，他想了一下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没有在高校工作的经历，但是到了晚年，如果能够参与人才培养这样有意义的工作，我愿意出把力。’这样，第一次接触，我们就达成了以后共同工作的默契”。“我还记得彭先生第二天要出访日本，我们当即给他以东北大学教授的名义印了名片，并与他共同研究确定新组建的这一学院名称为文法学院。”看似十分复杂的人选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迎刃而解了。事业需要他，他也愿意为这一事业出力献身，这也是一种高层次的“双向选择”。可以说，是定安同志的学识、人品促使他走马上任的。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完全证明了定安同志担此重任是当之无愧，众望所归。时隔数载，如今是东北大学党委书记的蒋仲乐教授与定安同志已“从相识到相知”，彼此间加深了了解，对定安同志的评价无疑也就更加客观、更加准确了。请读一读他的这篇文章的一段结语：

我今年已经 60 多岁了，在我的一生中接触的人很多，其中不乏政府高级官员、著名专家、学者及企业界人士。能具有彭定安先生这样视野的可以说凤毛麟角，在我心目中，除彭先生以外，还有一个人，他是新加坡温兄弟集团总裁唐先生。听他谈话，是纵论世界大势，而彭定安先生是纵论世界文化发展大势。除他们两人以外，给我的印象之深刻

找不出第三人。对彭先生有这样认识的，在东北大学还有许多。我记得1996年全校中层以上干部政治学习，彭先生作专题报告，题目是《世纪之交：人类文化的转型与重构》，内容是讲当代文化发展态势与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报告之后，学校的几位资深博导向我反映说，彭先生的报告非常之好，对他们启发很大。他们共同认为在‘东大’范围内，能作这样高水平报告的，只有彭先生。彭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人。

如果要对彭先生在‘东大’这几年的工作作出一句话的评价的话，我会这样讲：在全国著名工科大学创办文科学院，彭先生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他的学问及为人表明他是中国文化界的优秀代表。

定安同志的宽厚待人、谦虚谨慎是出了名的，对人真诚热情，全力相助。在他的鼓励下，青年学者武斌由哲学转向文化学研究，1992年开始撰写《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这是一项大工程，难免使人望而怯步。武斌给远在德国访学的定安同志写信述说自己的胆怯和犹疑。他在回信中不仅仅是一般鼓励，而且谈了他对这一课题的理解和具体的研究思路。以后，历时几年，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切磋，篇章的设计安排，有他的心血，甚至有些篇章的标题都是他拟的。当近200万字的书稿送到定安同志的案头时，他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从头到尾仔细披阅一遍，还亲自动手，增补不少文字。同时写了几万字的《读稿札记》，帮助作者加工润色，写了长达万余言的序言，在刊物上发表，提携后学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所以，武斌满怀感激之情著文倾诉：“从

全部意义上说,《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这部真正‘大部头’的著作。是彭先生与我合作的成果,而且是一次从始至终的、相当愉快相当成功的合作。现在,这部著作就要出版了。但是,书上并没有署他的名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和我都没有这样想过。不过,彭先生之于这部著作的意义,之于我的学术生活和学术成长的意义,已远非署个名字就能包容的了。”(《平生风谊兼师友》)

每年的阳春三月,都要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1963年1月8日在《辽宁日报》上首次刊出宣传雷锋事迹的报告文学《永生的战士》,其执笔者竟是被迫隐姓埋名的彭定安同志。正是这篇8000多字的报告文学,于当年的2月5日被《中国青年报》转载,随之引发《中国青年》杂志于2月12日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请求为雷锋同志题词的壮举。3月5日,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的题词同时发表,从而在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如今,雷锋不仅是中国人学习的楷模,而且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学习的榜样。正如邱长发在《大家风范》一文中所说:“雷锋这位已故的普通士兵,所以能成为‘永生的战士’,这不能不说与彭定安先生当年的报道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关系。这些可以载入史册的事情,似乎可以大大的炫耀一番。可他却是早已把这些淡忘了,别人不讲他则很少提及。”可见,任何居功自傲都是与定安同志绝缘的。

定安同志何以能够永葆革命青春,永葆晚节清明,成为人人景仰的大家、学者,名副其实的文化人。其关键在于他几十年如一日重视读书、酷爱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学识、净化自己的心灵。古语云:“非学无以广才。”(诸葛亮)“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刘勰)正因为他做到了活到老、

学到老，所以，才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而生动地吸收一切新知识、新信息、新成果、新观念，并把这一切的‘新’东西都融会于他的知识和学问体系中。”从而成为“一位‘通儒’。”“一位具有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学人。”（武斌：《平生风谊兼师友》）邱长发为了写好《大家风范》一文，曾与定安同志促膝长谈，从而较为准确地揭示了这位文化学者的内心世界，就“读书之乐”他写道：“岁月流逝，彭定安已步入70高龄。但读书之乐仍然是他生活中主要的、基本的、生存状态之乐。如今之穷已不在金钱，而在寿命与时光。（按：重点号为笔者所加。此言极富哲理，值得人们特别是步入老年行列者深长思之。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一切向钱看”几乎成为时代语与时代病，但钱同寿命与时光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何况人入世时两手空空，出世时空空两手呢。金钱固然重要，但不能被它迷住双眼、捆住双脚、葬送德行。）当他环视满架图书的时候，既有坐拥书城之乐又有读不过来、急于读而又无更多时间来读之苦。然而每每在他读书偶有所得的时候，便乐不可支而不觉老之将至。他不惮以文艺作品为消遣，而以读费神、须思索之书为乐。彭定安认为：思考与探索，总是予人以快乐的，是生之欢乐。这仍然是他的生存模式，仍然从读书中得到文化消解和对世界——社会——时代——历史——人生终极价值的尽垒式积淀的体认。”

我以为，书中诸文都体现了“实话实说”，从而也就多侧面地描绘了定安同志为人与为文的真实面貌，生动地展现了一位文化学者的高尚品格。让更多的事实说话，比之我的任何概括和分析要有力得多，这就是我之所以作一次“文抄公”的缘故。好在“文无定法”，就让这篇读后“引”、读后

感，权当此书之序。自然，如若知其主人公的全人、全貌，请诸君详读这部充满亲情、友情、真情、激情的纪念文集。

人生多艰，岁月无情，几十年的生活历程只是“弹指一挥间”。作为革命者，作为共产党人，既不回避老之将至、已至，又不因此而空耗尚存的有限岁月。定安同志说得好：“我亦垂垂老矣。我并不感到‘不知老之将至’而欲作豪言壮语，但也不叹悼韶华已逝暮年无为，还想有新的创获。”正是“黄昏岁月夕阳心，犹自奋励写新意。”（《老枝新花显生机——喜读〈张望版画选〔一〕〉》《辽宁日报》1990年2月17日）这才是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所持的科学态度。不过，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人年龄段的最新划分标准：44岁以下为青年人；45至59岁为中年人；60至74岁为年轻的老年人；75至89岁为老年人；90岁以上为长寿老年人。年近70的定安同志仍属于年轻的老年人之列。他面对着的仍然是“老枝新花显生机”的美好时光。预祝他不断取得“新的创获”，生机盎然，健康长寿。

目 录

文化学者的高尚品格：来自友人的真实素描

- 序《超越忧患的求索》…………… 王建中 (1)

总 评

- 一点感想…………… 刘异云 (3)

收尽春风不了情

- 为彭定安同志从事学术活动 40 周年作…………… 沈显惠 (7)

闪光的足迹

- 纪念彭定安学术活动 40 周年…………… 牟心海 (10)

久仰高山慕海深

- 赠彭定安先生…………… 陈巨昌 (13)

他塑造他心中的鲁迅

- 彭定安简论…………… 宋学知 (14)

定安同志的人品与文品

- 我的所见、所学、所感…………… 王建中 (28)

- 简论彭定安…………… 李作祥 (47)

- 题赠彭定安教授四首…………… 马成泰 (54)

- 彭定安先生社会学学术思想述评…………… 赵子祥 (56)

“鲁迅世界”的探索者与“鲁迅学”的奠基人

- 彭定安的鲁迅研究 李春林 (62)
- 学者如灯
- 彭定安先生与批评 海 涛 (107)

素描与印象

- 定安同志是我的学长 刘黑枷 (113)
- 暴雨急风忆当年
- 记患难老友彭定安 于 铁 (115)
- 学者彭定安 陈 屿 (123)
- 我和定安近半个世纪的交往 刘文玉 (128)
- 学会的组织者 学术的带头人
- 谈彭定安教授对辽宁省比较文学研究工作的贡献
..... 张朝柯 (131)
- 重友情薄名利的学者、教授
- 我所敬重的彭定安同志 陆文采 (135)
- 从定安同志那里我得到的甚多 王向峰 (140)
- 我与彭定安从相识到相知 蒋仲乐 (143)
- 说说老友彭定安 霍庆双 (150)
- 我对彭定安的几点深刻印象 吕秀珍 (153)
- 美好的记忆 贺修俊 (155)
- 雅人深致
- 小谈彭定安 王中才 (157)
- 我景仰的老师彭定安 王树茂 (161)
- 关于彭定安同志的二三事 周兴华 (165)
- 定安先生治学为人风范二三事 刘远图 (173)
- 情意绵绵四十年 李宏林 (189)